

人类学论丛

【第3辑】

FUJIAN QIAOXIANG DIAOCHA

QIAOXIANG RENTONG QIAOXIANG WANGLUO YU
QIAOXIANG WENHUA

福建侨乡调查：

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

李明欢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人类学论丛

【第3辑】

FUJIAN QIAOXIANG DIAOCHA

福建侨乡调查：

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

李明欢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建侨乡调查: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李明欢等著. —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ISBN 7-5615-2374-3

I. 福… II. 李… III. 侨乡-社会调查-福建省 IV. K927.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3190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新嘉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1 000 册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导言:走入福建侨乡	(1)
一、福建侨乡研究的定义、内涵与意义	(3)
二、福建侨乡研究的学术回顾	(11)
三、本书的研究架构与理论思考	(21)

上编 侨乡个案类型篇

第一章 侨乡认同的历史记忆:一个传统侨乡	
的现代表述	(35)
第一节 新安侨乡的历史人文背景	(36)
第二节 海外新安社群的形成	(46)
第三节 在互动中建构侨乡认同	(72)
第二章 侨乡网络的现代拓展:一个新兴侨乡	
的时代建构	(96)
第一节 明溪县沙溪村新移民概况	(97)
第二节 出国人员谈出国	(102)
第三节 本土干部群众看出国	(111)
第四节 学校与庙宇	(117)
第五节 国内外移民的互动	(124)
第六节 出国潮中的资金流动	(131)
附录一 沙溪家庭海外劳务关系问卷	(140)

附录二 福建省明溪县沙溪新侨乡问卷 调查总结·····	(147)
第三章 侨乡文化的编织传承:一个特殊侨乡 的形成发展·····	(156)
第一节 华侨农场建立的历史人文背景·····	(163)
第二节 松坪农场归侨社区的形成·····	(165)
第三节 松坪农场归侨社区的特点·····	(172)
第四节 在互动中建构群体认同·····	(184)
第五节 在重建家园中重构地域认同·····	(198)
第六节 结语·····	(209)
下编 侨情考察专题篇	
第四章 “侨”牌效应:福建侨乡的社会经济学考察 ·····	(211)
第一节 晋江侨乡社会的形成·····	(213)
第二节 1949年前海外华侨与家乡的经济联系 ·····	(223)
第三节 1949—1978年间海外晋江人 与家乡的经济联系·····	(231)
第四节 1978年之后海外华侨对家乡 经济发展的贡献·····	(240)
第五节 海外华侨华人与农村现代化·····	(256)
第六节 经济活动中的海外华侨 与地方政府互动·····	(259)
第七节 结语·····	(265)
第五章 来来往往:福建侨乡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	(268)
第一节 近现代福清两次移民潮追溯·····	(270)
第二节 赴日返回人员与跨国社会网络·····	(280)
第三节 神户福清籍华侨国内亲属调查·····	(304)
第四节 结论与思考·····	(316)

附录 访谈个案资料.....	(319)
第六章 侨乡社会资本:福建当代移民潮	
的社会人类学考察.....	(328)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定义.....	(329)
第二节 跨国民间网络:侨乡社会资本	
的基本载体.....	(335)
第三节 跨国互惠期望:侨乡社会资本	
的运作机制.....	(342)
第四节 跨国链接增殖:侨乡社会资本	
的效益特性.....	(347)
第五节 “侨乡社会资本”的解释性意义.....	(352)
参考文献.....	(356)
结语:解读福建侨乡	(361)
后记.....	(373)

导言：走入福建侨乡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 IOM)2003年6月10日发表的一份综合报告,在当今世界上,有1.75亿人生活在自己的出生国以外,世界上平均每35人当中就有一人是跨境移民。“以往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和人道问题,这方面的问题目前依然存在,但现在人们选择移居他国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和社会原因。”在全球化进程中,既出现了可以视整个世界为个人叱咤风云之舞台的“国际性人才”,也奔涌着为追求个人或家庭更美好生活而跨国流动的普通劳动者,迁移已日渐成为现代人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与人口跨境迁移空前增长相伴而生的,是不同国家、民族能否在可持续发展的总原则下和平地共享地球资源,友好地共谋长远发展的尖锐挑战,这是一个涉及当今世界能否实现和平发展之理想的严峻的现实问题。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在当今世界上,曾经被视为人类社会理想图式的多元文化世界的美妙想象,与现实生活中异文化之间磕磕碰碰乃至你死我活的冲突,业已伴随着世界人口空前规模的你来我往,更加尖锐地提到了各国政治家的议事日程上,也活生生地展现在亿万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面前。当今世界业已进入“国际移民时代”,不同族群、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或交融将是新世纪的主题,这既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也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孜孜不倦进行探讨的热点问题(参

阅: Stark, 1991; Castles & Miller, 1993; Cornelins et al, 1994; Massey et al, 1998)。

正是在如此社会大背景下,因历代乡民在本土和异域之间熙来攘往而形成的中国侨乡,因跨境迁移源源不断而一再吸引国际社会关注的福建移民社群,在时代层面上再次凸显其经久不衰的社会文化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从中国大陆以不同方式、通过不同途径移居到世界各国的新移民,大约在300万到400万之间,其中源自福建的新移民一般认为业已超过50万。由于福建新移民以农村普通劳动者为主,其中通过非正规途径前往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迁移者数量多,影响大,因而成为当代中国新移民中最为吸引国际社会关注的一大地缘性群体。近一二十年来,八闽大地经济高速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步步提升;但与此同时,却有一批又一批福建人自发地、以付出数万乃至数十万人民币的昂贵代价,历经难以预料的风险走上跨国迁移之途——如此凸显尖锐矛盾的社会现象不能不令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当“福建移民”(或曰“福建船民”、“福建偷渡客”)问题一再成为欧美及日本媒体的新闻卖点时,当西方从移民官员到记者、学人络绎不绝地“申请”进入福建侨乡进行实地考察时,我们作为工作在福建本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更是时时感受到自己肩负的职责与面对的挑战。

在中华大地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时代,福建侨乡的文化表征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福建侨乡的社会影响派生了什么新现象?总之,福建侨乡的时代意义如何?紧迫的社会责任感促使我们在繁忙的教学之余,一次次深入福建乡村民间,了解新老侨乡形成的历史与变迁,解读新老侨乡人的心态与追求,剖析新老侨乡的时代意义。

本书作者分别任教于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和华侨大学,分别接受过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专业

训练。我们的学科背景、任职单位虽然不同，但是，彼此对于华侨华人研究的殷切关注，促使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多年生活于福建，因种种原因时常奔走于福建的山山水水之间，耳闻目睹之处，从民间传统的“侨乡”标识，独具特色的“侨乡文化”，直到当代颇为时髦的“‘侨’牌经济”、“侨乡发展战略”，可谓比比皆是。可以说，福建侨乡之于我们，既那么熟悉，又有那么多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带着满腔的热情、兴趣，还有满腹的疑问，我们分别深入一个个各具特色的福建侨乡，仔细观察，耐心询问，深入访谈，用心体验。本书是我们走入福建侨乡进行多年调研后，向我们的研究对象、向关心我们研究的朋友、向支持我们研究的相关部门递交的一份研究报告。

走入福建侨乡，解读福建侨乡，通过大量的、长期的追踪调研，在把握新老侨乡时代脉络的基础上，将一个真实的福建侨乡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我们认真执著的学术追求，也是我们当仁不让的社会职责。因为，我们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结合福建侨乡特点加入国际移民研究对话，增进国际移民学界对福建侨乡的正确认识与合理关注，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福建侨乡研究的定义、内涵与意义

何为“侨乡”？简而言之，“侨乡”即“华侨的家乡”，在当代中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按照《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侨乡卷》的定义，“侨乡”所标识的是这样的一些特殊地区：第一，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人数众多；第二，与海外亲友在经济、文化、思想诸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尽管本地人多地少，资源缺乏，但由于侨汇、侨资多，因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第四，华侨素有捐资办学的传统，那里的文化、教育水平较高。

在现实生活中，侨乡是一个没有明确边界、没有定量内涵的

概念。侨乡之大可以大到涵盖某一整个省区(如最早为人们所熟知的“闽粤侨乡”，以及近年来相继强化其“侨乡”特色的广西、海南、浙江等省)；而“侨乡”之小亦可小至仅仅包容一村一镇(此类小“侨村”在闽粤两省如星罗棋布，不可胜数)。《福建省志·华侨志》依据福建全省各地华侨、归侨、侨眷与本地人口比例之多寡，对所谓“重点侨乡”和“一般侨乡”做出如下定量界定：^①

重点侨乡：华侨华人总人口在 10 万以上，或相当于该县(市、区)总人口的 20% 以上，侨汇较多，与海外关系比较密切；

一般侨乡：华侨华人在 10 万以下，1 万人以上，或是相当于该该县(市、区)总人口的 20% 以下、5% 以上。

照此规定，福建省划定的“重点侨乡”包括：泉州市的鲤城区、晋江县、南安县、惠安县、安溪县、永春县、石狮市、德化县；厦门市；漳州市的芗城区、龙海县、诏安县；福州市的福清县、闽清县，宁德地区的古田县、屏南县，以及莆田县、永定县，还有金门县等 20 个市、县、区。一般侨乡则包括龙岩、南靖、漳浦、云霄、东山、华安、闽侯、长乐、平潭、仙游等十个县、区。^②

以上条规，无论是侨乡的划定，或是重点、一般侨乡的区分，都有若干可商榷之处。例如，“侨乡”四项定义中的“人数众多”、“侨汇、侨资多”如何量化？而“资源缺乏”则显然并非所有侨乡的共同特点。又如，由于华侨华人构成十分复杂，再加上一代又

① 广东、广西、海南等省的情况略有不同：广东省有重点侨乡 43 个，一般侨乡 22 个；广西的重点侨乡有 14 个县市；海南则有重点侨乡 6 个县市。若以闽、粤、桂、琼四大侨乡合计，则共有重点侨乡 83 个市、区、县(参阅《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侨乡卷》，第 804 页)。

② 详见《福建省志·华侨志》第 183 页。由于华侨华人构成十分复杂，如果再加上大批在移入国出生之华裔的身份构成，则以上量化统计显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如此规定毕竟是迄今为止正式公布的可资凭据的考量标准。

一代在移入国出生之华裔以及近一二十年来通过各种渠道迁居国外的新移民,要获得“华侨华人人数的准确统计数据谈何容易,因此,以华侨华人之总人数作为界定“重点”或“一般”侨乡的重要依据缺乏现实的有效操作性。尽管我们意识到如此种种问题,但是,第一,在没有更权威或更全面的定义公布之前,以上定义毕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主要分布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侨乡侨情;第二,我们采取的并不是以考据、概念演绎为主的经院式研究方法,而是注重实地调查,力图如实地描述福建侨乡的历史与现状,进而探讨发人深省的现实问题,因此我们在本书中还是援引上述条规作为我们考量当代福建侨乡的参照标准。

我们认为,伴随着人口跨国迁移而形成、并且长期维系的超越国境的亲缘、乡缘网络,是“侨乡”的总体特征。侨乡起源于何时?这是一个迄今尚无定论的问题。如果将其定义为跨境迁移人口在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的互动,那么,此类现象早已有之。就福建而言,关于亲缘纽带跨境互动的早期记载,可从族谱方志中寻得若干史证。例如,在晋江县大仑乡《蔡氏族谱》中,记载明嘉靖年间(1532—1566年),移居菲律宾的大仑人寄款回家“买地盖屋”,并借贷银两给原籍亲人经商。^①又如,在我们的调查点厦门海沧新安村,从1527年第一位乡民“过番”南洋文莱始,接踵“过番”者络绎不绝,至清同治丁卯年(1867年),族谱中明确记载之有名有姓的“过番”族人累计达2226人,新安与其海外乡人之主要聚居地马来亚槟榔屿之间保持着长期的密切交往(参阅本书第一章)。再以我们的另一个调查点福清为例。17世纪初日本德川幕府初期,辟长崎为商埠,此时明朝也松弛海禁,于是,借地利之便,不少以“淘海”为生的福清青年男子纷纷

^① 转引自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华侨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1页。

到航行于中日之间的商船上当水手。当时的习俗，水手往往携带一些物品到彼方口岸出售，牟取额外收入，以养家糊口。由此，渐渐形成福清人在日本以行贩谋生的模式，而福清地区也因赴日人口增加、来往密切而形成以日本为主要指向的迁移文化（参阅本书第五章）。

但是，“侨乡”作为一个特殊的概念，则又不仅仅是跨境外迁之乡民与家乡的互动所能完全承托的，而且，从个别现象出现到成为被主流社会认可的一种文化模式，必然要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就严格意义而言，“侨乡”应当是“华侨”之概念形成后的衍生物，是某些乡村因“华侨”人数众多，进而形成既与自身此前之传统不同、也与其他非移民地区风貌有异之后方才显现的特殊标识。再者，作为一个被中国文化正式认可的概念，何时得到官方的认可并进入社会主流话语，也是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侨乡卷》依据华侨人数激增，经济力量增长，晚清政府开始重视海外华侨的实力及作用，并正式向外派遣官员拓展侨务等因素，以 1840 年之后的晚清时期作为“侨乡”概念形成的年代，是可取的。^①

就福建而言，从鸦片战争爆发后的 1841 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1949 年间，是海外华侨群体及境内侨乡数量在互动中明显增长的年代。根据福建省海关的登记资料，在此期间，正式经福建海关出国的总人数达 580 万，年均出国 5.3 万人；同期回国人数近 400 万，年均回国约 3.6 万人。两相抵扣，累计在此一百余年间，福建出国并留居国外者（包括埋骨国外者）总数近

^① 此处依据的是《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侨乡卷》的观点，详见该书第 803 页。

187 万人。^①当然，这一统计所涵盖的只是实际出国人口的一部分。因为，其一，福建与南洋之间的民间往来渠道众多，再加上相关政府部门曾在若干时期制定过“限制出洋”的法令法规，^②一些人只好以非正规方式出国出境，因此，未曾列入海关正式登记的移民总数恐怕相当可观。其二，时至上世纪 50 年代之前，大量海外华侨依然保持着中国国籍，而其出生于侨居地的下一代大多数也随父辈隶属于中国国籍，因此华侨的实际数量远远高于“出国者”的统计数据。厦门侨务局曾于 1940 年就海外侨情进行一次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当时在海外的闽籍华侨总数约 225 万人，占全世界各省籍海外华侨总数的 30.6%。^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1955 年，由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发布的一份统计数据表明：是时海外闽籍华侨总数已增至 367.7 万人。^④

福建是家族制度发展十分严密、完善的地区（陈支平，1991；郑振满，1992），个人的迁移行为，往往背负着提升整个家族命运的殷切期待。因为下南洋过番邦谋生者，多以日后能够在家乡购地建房、福荫家族为人生追求，怀揣着有朝一日衣锦还乡的美好愿望，因此，大多数人在海外艰难谋生，稍有余钱即汇回家乡，

① 厦门大学戴一峰教授曾根据福建省各海关年报统计资料，制成近代福建华侨出入国人数统计表，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此处系根据相关统计表中的数据归类计算而成。

② 例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福建省政府曾于民国 30 年（1941）3 月 6 日公布《福建省战时限制人民出国暂行办法》，规定“年满 16 岁至 50 岁人民限制出洋国”。

③ 厦门侨务局在民国 29 年（1940）的调查统计数据。转引自《福建省志·华侨志》第 22 页。

④ 据 1955 年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编印的《本省华侨分布情况》公布的统计数据。转引自《福建省志·华侨志》第 24 页。

赡养家小，盖屋起楼，乃至投资兴业。以晋江大仑为例。1956年的调查显示，该村完全靠侨汇生活的侨眷占全村总户数的14%，30%主要靠侨汇生活，7%部分靠侨汇生活，全村约52.2%的农户多多少少从侨汇中得益（参阅本书第五章）。有关专家的宏观统计也表明，1905至1940年间，由海外汇入福建的侨汇总计达15.4亿元以上；^①1912年至1949年，福建华侨投资家乡的户数为4043户，投资总额约1.29亿元，年均348万元。^②由此可见，千百万普普通通跨国迁移者为赡养家人汇回的侨资，是侨乡形成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一方面，大量海外侨资注入福建民间，改变了侨乡地区的神情乡貌，改善了侨眷的家庭生活，带动了当地的消费水平提高，间接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因为下南洋者以青壮年男性为主，造成侨乡成年人群中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而且，因主劳动力缺失而形成依赖侨汇的消费型社会风气，以及异域奋斗者“衣锦还乡”时的炫耀性消费等习俗，也相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随着一批又一批青壮年走向南洋谋生，随着一幢又一幢依靠侨资建起的“洋楼”矗立于穷乡僻壤，有侨汇收入与无侨汇收入之农户的生活水准渐渐拉开了距离。由于侨乡及侨乡周边地区人眼中能够看到的多是那些成功者，而还乡者也有意展示其“成功”的一面，因此，侨乡经济改观及虚荣消费的两面性都十分突出。然而，也正是这种相互矛盾的特性，张扬了侨乡的个性，赋予侨乡以特殊的社会文化地位。

随着福建人在本乡本土与以东南亚为主的外域他国之间形成来来往往的迁移潮，大大小小的“侨乡”相继在濒临海洋的闽

^① 根据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中提供的数据统计。

^② 详见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

南各地，在客家人聚居的内陆山区应运而生。考察社会话语，我们不难发现，从侨乡、侨户、侨属、侨汇、侨资、侨房到侨校、侨领、侨团，以及与之相关的番邦、番客、番楼、番婆等等“侨”字号词汇，日渐广泛地融入了福建本土各色方言之中，为八闽之人耳熟能详，是为侨乡特色的形象化折射。

“侨乡”系因“侨”而生，自然应当随“侨”之变而变。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海外华侨社群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化：以定居东南亚为主的数千万海外华侨因应国际形势的变化，绝大多数相继入籍当地国，从而在国籍隶属关系上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已“褪去”了外在的国籍身份符号——“华侨”，转而成为与中国在国家政治隶属关系上的“外国人”，也就是当代中国大陆身份认定术语中“持有住在国国籍”的“华人”。当海外华侨群体发生如此整体转型之后，似乎“侨乡”之“侨”也应当随之消失了。的确，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中国大陆本土“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侨乡”因为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受到蔑视，甚至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尤其是在极“左”路线甚嚣尘上的“文革”期间，“海外关系”几乎被等同于“反革命关系”，^①在那种非正常的政治氛围中，海内外基于亲情乡缘的互动或被迫中断，或暗中转入“地下”，即使是在侨乡侨眷中，多数人也对“侨”字话语噤若寒蝉，“侨乡”几乎

① 1970 年中国“文革”期间，“四人帮”曾在广东炮制过处理有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规定，主要内容有：“凡是有港澳、海外关系的干部，不管亲属从事什么事业，如果经过教育，仍然保持政治、经济联系，要从严处理”，“要视情况进行必要的批判斗争教育，并要进行审查（严重的要清理出队，有的退职）”。今后“一律不吸收有海外、港澳关系的人当干部，对干部的婚姻要把好关”等等。上述规定曾在广东部分地、县试点，并在全省整党会议推行，造成恶劣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上规定被称为“黑六条”，遭到彻底否定。

名存实亡。还值得一提的是，在诸如本书所调查的新安村那样的传统侨乡，那一二十年间海内外族亲之间的隔绝、误解所留下的后遗症，影响迄今犹存。

改革开放给中国大地带来了新生，海外关系成了“好东西”，^①侨乡人不仅又可以名正言顺地以拥有海外关系为荣，而且纷纷谋求通过海外关系争取最大发展。于是，通过“侨乡纽带”及其延伸，境内外从信息传播、资金流动、人口迁徙到民间习俗复兴的互动在多层面上争相展开，成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在传统侨乡地区，如福建之晋江，自改革初起，即出现了令内陆人瞠目结舌的大规模“洋货走私”，一船船舶来品源源而至，从五颜六色的“奇装异服”，方便实用的“洋伞洋包”，直到播放着邓丽君“靡靡之音”的“三用机”（收录机），无不通过“侨乡纽带”登陆福建沿海，并迅速转销内地，而晋江侨乡人则从中捞到了致富的“第一桶金”。至于随后因地制宜利用侨乡种种闲置资源起步的民间小企业，更迅速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晋江模式”。随着侨乡在改革开放中的特殊作用日益凸显，“侨乡”迅速成为重现于当代社会的主流话语。政府强调“侨”牌经济、“侨乡纽带”、“侨乡优势”乃至“侨乡发展战略”，民间则津津乐道于身为“侨乡人”的种种特殊性，因为，从审批出国出境、复兴宗族组织到重修祖坟、宗祠、寺庙，几乎都可在“侨乡特殊性”的旗号下享受某种“特殊照顾”，并名正言顺地争取身为归侨侨眷的优惠待遇。

“侨乡”所显示出来的种种优越性及随之带来的种种实际利益，在无形中刺激、影响着那些非侨乡地区。在福建一些原本并非侨乡的地区，相继有些人通过不同途径也走上了移民之路，并

^① 详见1977年10月2日邓小平接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夫妇的讲话。

且迅速带动了当地的移民潮，如本书所研究的福建明溪县沙溪乡即为典型个案之一。这是个原本与跨境移民并无直接关系的乡村，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有人率先移居欧洲之后，仅仅经过短短十多年，沙溪乡就成为移民人口达20%以上的新的“重点侨乡”，而沙溪乡所在之明溪全县也因旅欧人口达到“一般侨乡”所要求的5%，成为一个县级新兴侨乡。更有意思的是，该地区从领导到普通群众，都十分赞赏本地乡民从跨国互动中衍生的效益，县领导以成为“福建旅欧第一县”为荣，而沙溪乡及其所属之沙溪村也分别以成为“旅欧第一乡”和“旅欧第一村”为耀。无独有偶。2004年夏，本书作者李明欢、詹冠群曾先后前往福建另一个内陆山区建阳县苦竹坪村进行调查，该村从一个与欧洲毫无关系的小山村，历经短短十多年的跨国迁移潮后，出国到欧洲的村民就达到本村人口的27%，而且其中90%以上在意大利谋生，于是，这个默默无闻的深山小村，一跃成为名闻建阳、邵武两地的“意大利村”。作者在当地调查时，从各级地方干部到普通村民的言谈举止中，同样可以时时感受到他们对于深山里出了个“新侨乡”所表现出的兴奋与自豪。

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伴随着跨境迁移的潮流不断漫延，新侨乡还会出现，侨乡网络还会扩展，侨乡功能还会变化。可以说，在进入21世纪的中华大地上，“侨乡”之言、之实、之意、之情沸沸扬扬，甚至令人有纵向蒸蒸日上、横向八方延伸之感。以福建侨乡为个案的研究，其时代意义或许因此而更加应当提升。

与时俱进的中国侨乡，呼唤着与时俱进的侨乡研究。

二、福建侨乡研究的学术回顾

福建侨乡以其特殊的社会文化景观，吸引着世人的关注，也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海内外研究者纷至沓来，勾勒历史，探讨问